

揭示全球化时代
中美经贸纷争的政治逻辑

中美经贸关系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北京大学 王勇■著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天下风华学术精品系列

www.glamourpress.com

中美经贸关系

北京大学 王勇 / 著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中国市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美经贸关系/王勇著.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5092 - 0192 - 3

I. 中... II. 王... III. 对外经济关系: 中美关系—研究
IV. F125.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8709 号

书 名: 中美经贸关系

作 者: 王 勇

责任编辑: 孙 忠

出版发行: 中国市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3 号楼 (100837)

电 话: 编辑部 (010) 68033067 读者服务部 (010) 68022950

发行部 (010) 68021338 68020340 68053489

68024335 68033577 68033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 1092 毫米 1/16 28.25 印张 490 千字

版 本: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2 - 0192 - 3

定 价: 55.00 元

推 荐 序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探究，可以也必须建立在两个不同研究领域的交会点上。第一个领域是中美关系，包括两国在安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经贸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领域中，国际政治理论及其分支提供了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另一个领域是国际经济，包括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等分支，各自有其理论分析框架的支撑。

读完王勇博士这部《中美经贸关系》，感到很兴奋，因为在我眼中，它正是在中美关系和国际经济的交会点上盖起的一座标志性建筑。这部书的时代背景是还在加速发展的全球化。它的学术基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即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结合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同时，它不满足于在原有理论框架上填充新的内容，而是在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中大量鲜活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构想，澄清了许多原本大而化之甚至似是而非的认识。

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其基本视角之一是国家与市场的两分法，即通过分析国家政府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判国家的对外经济行为和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将社会（主要是利益集团）的因素引进研究之中，但明确提出“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度、多角色互动”的框架，并对中美经贸关系进行详尽分析的，王勇博士是第一人，是开拓者。

我以为，只有像本书这样，将两国的“社会”作为重要角色，将中美两国国内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劳工组织、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才能找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点，对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诸多难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向美国人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中美经济具有强大的互补性，经贸关系是一个双赢格局。我们更相信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美国人却似乎并不“领情”，不“买账”，而总是在制造经贸摩擦，压人民币升值；美国社会中的“反全球化”情绪，比中国社会还要激烈。如果我们不作社会层面的深入分析，就只能认为美国是在颠倒黑白、别有用心、遏制中国发展。

通过本书的论述可以看到，虽然从国家宏观层次上说，中美经贸关系的确是双赢的，而美国也的确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但美国的许多产业如纺织业、制鞋业、家具制造业，却是中美经贸竞争中的输家，而相关产业的工人，某些地区和某些阶层的美国人，客观上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这些输家、受害者，以及号称代表他们的利益集团和政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自然要向中国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加剧了一些领域的中美经贸摩擦。由于美国社会一贯提倡自由竞争，同时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长期偏向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就是大企业财团和富人，致使社会贫富悬殊不断加大，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本书充分探讨了两国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细细分析下来，中美经贸往来中两国的有些利益集团是双赢的，或者可以做到双赢。正如本书第一章提到的，中美经济的相互开放和彼此渗透，延长了各自国内利益的链条，促生了中美间的一些“跨国利益集团”。比如，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压力不仅让美国企业得益，而且中国民营企业也获得了市场准入的好处。这就是一种形式的双赢。第五章指出，即使在摩擦最公开、最激烈的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中，也有典型的中美“利益共同体”：中国企业在对美纺织品服装中获利，美国国内进口商与零售商、消费者组织等组成的开放贸易集团，还有向中国出售棉花、化纤等原料以及纺织机械的美国公司，都是赢家。

但是，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同样随处可见。比如，美国经济中不断萎缩的纺织业集中分布在东南部的几个州，对于那里的纺织服装制造业及其雇员来说，占领美国市场最大份额的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当然就是“威胁”。同样，对于被沃尔玛公司挤占了国内零售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这家世界最大零售商大举进军中国绝不是什么“福音”。在这些竞争领域，有赢家就必有输家。

中美经贸关系中“双输”情况也不少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来说是好消息，但对某些中国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商来说，

就至少是暂时的“双输”。虽然盗版行为能使某些企业、商家获益，如果任凭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泛滥，中美两大经济体都是长久的受害者。美国一些失去相对优势的产业声称，中国产品拥入美国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美国的劳工组织也在大声疾呼中国劳动成本太低。尽管我们可以根据市场竞争的规则来对这些论调加以驳斥，但这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受损，应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方面，也并非所有人都能从大量廉价纺织品出口到美国而获益。据估算，国内纺织品制造企业在对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整个交易利润总额的10%，其余90%的利润则被国外服装品牌所有者、美国批发商和进口商共同赚走。于是，相关企业的劳工待遇就可想而知了，“血汗工厂”现象并不是无中生有。

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中美两国社会中的跨国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在大量增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来研究中美经贸关系，远远不能说明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甚至可能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传统国际冲突的零和模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以及政府间协议的作用下降了。正如本书所指出的，中美两国政府都在调整各自政策并且彼此协调行动，以平衡国内各方利益，控制内外摩擦。美国亟需抑制过度消费，提高储蓄率，平衡国际收支；中国则应当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减少对外资和出口的依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保护劳工权益。在很多方面，国内政策的调整和各方面利益的权衡协调，比两国政府之间谈判解决争端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

本书描述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的现象，以及美国利用其相对优势向中国施压的事例，并由此指出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的明显的“不公平”问题。同时，作者也看到了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所具有的两面性，指出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还有作为国际“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一面。由于美国霸权的存在，国际经济体系维持了开放与稳定，大大降低了国际交易的成本与风险。在双边关系中，美国的压力可以转换为中国改革的动力。其实，美国霸权的稳定既减少了国际风险，又增加了不公正现象，这种两重性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也同样存在。关键是中国如何利用这一两重性发展自己，趋利避害。

本书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是抱乐观态度的，因为总体来说，中美互惠利益在增加，而且法治、市场经济、开放贸易等共同理念、共通原则也在增加。扩大双赢部分，减少零和博弈和双输因素，使两国社会中更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从中美互动中得到好处，是客观发展趋势，更是努力的方向。尽管中美经贸摩擦从表面上看正在扩大，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

透过公开争执去观察利益的互动和交换，可以看到经贸关系实际上是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动机和压舱石。如果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和相互合作以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相互依存的中美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发动机和压舱石。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王勇博士为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对美政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思路和中肯的建议。不过，既然书中着重强调了社会、行业和利益集团的因素，那么在给政府出谋划策的同时，似乎也可以给从事中美经贸交往的公司和个人提出更多的建议，帮助他们规避风险，解读政策，加深对中美国情的了解。这可以说是本书应该能够锦上添花的部分吧。

最后我还想说，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近年来，不少论著有一个通病，即以西方某一项理论为本为宗，作为论证的宏观起点，而后以已经发生的事件或数据“为例”，最终证实这项理论框架之正确。这样做学问是省力而快速的办法，但却无法取得任何创新。王勇这部新著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体现了应当着力提倡的学风。我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并愿意以撰文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和敬意。

2007年3月于北京大学

自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全球化的加深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与挑战。进入 21 世纪的中美经贸关系以其发展之迅速、变化之深刻、影响之巨大，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其实，此一进程并非自今日始，30 余年前两国选择结束对抗，构筑互利合作关系，开创了一个有利于两国与世界人民的新纪元。冷战的结束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中美两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分量，并加速形成了更加对等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美经贸交流又反过来促进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即使在世界遭受“9·11”悲剧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困难时期，全球化的步伐反而更快了。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稳定的力量。其稳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构筑共同利害关系，将两国紧紧“黏合”在一起，还在于编织一个复杂互动的跨国人际与组织的网络，让中美两个迥异的社会维持相互交往，增加了解，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彼此的看法。

但是，经贸关系也是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从这个角度讲，一部分现实主义者怀疑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是有其道理的。这是本书在深信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黏合”作用的同时，仍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经贸问题上的竞争、矛盾、冲突与斗争的原因。我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对中美两国具有明显利益的事情，为什么仍可能发生摩擦与冲突。事实也的确如此，尤以美国国内围绕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立法之战为甚。这样一个对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立法案，却需要从总统到国会领袖、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到工商企业界联袂做工作方能促成美事，让人颇感费解，可能远非“唱红脸”、“唱白脸”这样的认识所能完全概括的。这就是我采用利益集团政治作为理论框架分析、阐述两国经贸纷争的主要原因，也是作者在有关中美经贸问题第一本著作《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98）中尝试并坚持的理论与方法。

中美对外决策体制表面看来差异很大，这也是多数学者强调的，但其实又有诸多共通之处，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尤为如此。中美两国在国家促进本国工商业的海外经济利益方面越来越具有明显的共同点。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更加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两国之间的差异主要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间关系表现形式的不同。中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虽处于过渡时期，但是，政府与国有大企业间的紧密联系仍在继续，只是中小企业相对处于缺少代言的弱势地位，不过，这种状况随着行业协会功能的完善正在改变。美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发达的行业协会开展专业、高效的游说活动实现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起着决定方向的作用。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上，中美两国不仅有相似之处，而且还有趋同的趋势。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特别是行业协会作用的发挥，工商界作为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发展状态。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我们可以预计，所谓官—产—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将越来越成为两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常态，双边关系将更多的发生在相似的政治社会组织架构中。两者如何相互适应这一“趋同”的变化，未来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问题。

当然，研究经贸关系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中美经贸关系本身，而且关系到双边安全战略关系。正如欧洲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乔纳森·斯道理（Jonathan Story）教授在本书评审意见中指出的，从根本上说是思考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找出中国与国际社会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途径。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悟到，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和平崛起”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与全球利益和目标不断融合的过程，是一个与国际体系主导者美国在利益与价值取向上不断相互适应、调整的复杂互动过程。最容易妥协的部分恰恰就在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上的经贸关系中，而这个过程又受到国内国际复杂因素与利益关系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顺利地处理好经贸关系，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找出中美两国在全球安全战略格局中相互妥协的基础与办法。这是作者进行研究时的一个深层考虑。

要说明的是，本书虽力争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中美经贸关系，但由于时间与篇幅所限，不少重要问题领域虽有所涉及，但并未作专章分析，比如中美农业贸易政治、外国直接投资政治等问题，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这或许也是好事，因为在持续的追求中可能找到未来突破的方向。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心中最想表达的话语就是“感念师恩”。正是在求学路途不同阶段得到各位导师的指点，才使我得开愚钝，在学业上取得少许进步。这里要感谢小学、中学为我倾注心血的各位老师。特别感谢王缉

思教授，他是我本科学习期间的班主任，也是我国际关系专业思想的最早启蒙者，耳濡目染迄今，让我终身受益无尽。感谢硕士生导师袁明教授，求学期间给予学生特别的鼓励和鞭策；在我踏上讲坛之后，她又以对世界大势敏锐的观察，鼓励我勇敢地选择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这一“朝阳”学科，冀望我能开拓一片新天地。感谢博士生导师赵宝煦教授，赵先生平易近人，奖掖后学，学高道高，让人高山仰止。也感念负笈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期间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的指导，两周一次的博士论文写作讨论让我获益匪浅，中美师道虽有风格差异，但我同样领略到大家风范。这些先生长期亦师亦友，不仅在科研上予我指导，更在做人的态度上耳提面命。“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竭力不能学习于万一。

感谢北大国关学院的历任领导，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才创造出和谐的小环境，才使年轻教员得以抵制外界诱惑，安心寂寞的学术工作。感谢本院各位老师与同事多年的指导与帮助，从点滴的接触中我获得了很多的启发。

本研究是200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的一部分，感谢国家社科基金与北大科研配套资金的支持；感谢参加项目研究的所有专家，特别感谢张向晨、傅梦孜、张亚雄、郑建民、张鹏以及台湾童振源等朋友的参与和支持。

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努力主要围绕本课题研究活动进行，参与项目的国内外同事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与启发，特此表示感谢。1999年，作者在担任美国西部思想库太平洋国际政策委员会（PCIP）与南加州大学联合客座研究员期间，就中国加入WTO及中美经贸谈判开展专题研究，得到委员会主席Abe Lowenthal教授，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John Odell、院长Jonathan Aronson以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Otto Schnepf的鼎力襄助。与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Richard Baum、专栏作家Tom Plate等人的交往与讨论让我收获良多。

在对全美有关机构进行访问的过程中，作者应邀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斯坦福大学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机构发表演讲或与专家进行座谈。这些交流大大增加了我对美国学术界、政界与工商界对中国加入WTO问题态度的认识。对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陆伯彬（Bob Ross）、柯庆生（Tom Christensen）、张纯（Leo S. Chang）、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罗迪（Nicholas Lardy）、易明（Liz Economy）、Taylor Fravel等在此期间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时任美中贸

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柯白 (Bob Kapp) 先生的精心安排下, 作者分别对华盛顿、纽约几十家跨国企业负责人发表了两次演讲, 在与他们的讨论中亲身体会到美国工商界对于中国加入 WTO 的重视程度与热切期盼。

在有关“入世”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调查中, 我还得到了张向晨、张少刚、王远鸿、徐林、邓立、潘光伟、任厚祥等先生的帮助与指点, 在此表示谢意。

作者还不禁回忆起已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 (Michael Oksenberg) 教授对我有关 WTO 研究的多次支持与鼓励。他 1999 年邀请我去斯坦福大学亚太中心演讲, 对于我进行的有关中国加入 WTO 与中美经贸关系的“机制政治”观点十分赞赏, 并诚请我为其有关 GATT/WTO 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著作提出意见。不久之后, 他又专门邀请我去斯坦福开会, 参加有关台湾问题的模拟谈判与和解会议。奥克森伯格教授更在 1999 年底于弗吉尼亚州举行的中美关系高层研讨会上向与会学者官员强烈推荐笔者 1998 年出版的拙作。奥克森伯格先生在美国中国学研究界可谓桃李满天下, 其泰斗与领军人物的地位迄今无人替代。论对学生之关心, 对中国研究之专心, 对中美关系事业推动之功, 难有人超过先生的。哲人已去, 音容犹在, 以此文字对其表达缅怀。

在本书构思、写作的过程中, 作者有幸参加了“中美安全对话”的系列活动。作为中方对话成员, 我几乎参加了历年的活动, 无论是美国科罗拉多高原上 Boulder 山花烂漫中的木屋别墅闲话, 还是北京居庸关长城脚下的激辩, 无论是水乡周庄会议的争论, 还是夏威夷盛夏海滨的餐会, 我都从与会中美同行身上汲取了营养, 明显丰富了本书的构思。尤其要感谢“中美安全对话”项目中美双方发起人、组织者 Peter Gries 博士、唐世平博士、徐辉博士与吴心伯教授的辛勤劳动。

写作期间, 还有幸参加了日本学者倡导建立的“中日学者 21 世纪亚洲论坛”以及“东亚学者 21 世纪亚洲论坛”等项目, 论坛负责人毛里和子教授、天儿慧教授主张把中日关系放在更大框架下加以考察, 以期推动中日关系和东亚合作的实质发展。在半年一次的例会中, 中日双方成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对我来说, 这些时光至今难忘, 从中日同行们心与心的交流中我加深了对全球化与东亚、中美日战略关系以及东亚地区合作等关键问题的认识。尤其是与毛里和子、天儿慧、五百旗头真、山本吉宣、藤原归一、高桥克秀等日本学者的意见交换, 使我加深了对中日关系的信心。在历次访日中得到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唐亮、宫崎国际大学教授洪停杓、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高木诚一郎、川胜千可子等的热情帮助, 对此表示感

谢。作者也从中方对话成员张蕴岭、王逸舟、陆忠伟、杨伯江、黄仁伟、沈丁立、王少普、金熙德、田中青等学者身上汲取了很多智慧与营养。记得作者曾在中日总结会上提出建立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五百旗头真教授等的响应。我想，作为亚洲合作基石的中日关系必须搞好，其中凝聚共识、构筑一个知识共同体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这一中日对话应该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还有幸作为中方委员参加了韩国东亚基金会发起的“东亚协议会”的对话活动，对于文正仁教授等韩国学者表示由衷谢意。

本书研究写作中还得到了很多朋友、同行的帮助。20世纪80年代末在南京大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求学的同窗好友季瑞达（Ken Jarrett）、张清彦（David Blumental），是我经常与之讨论的对象，他们丰富的政府与业界经验为我观察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验证”想法的机会。德国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员 Heike Holbig、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公共管理学院安德根教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政府关系部前任副总裁 Michael Murtaugh、1994—1995年赴美求学期间同窗、《圣迭戈联盟论坛报》（San Diego Union Tribune）前任记者 David Smollar、美国哈佛大学台湾研究小组 Steve Goldstein 教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Miles Kahler 教授等，为我在《美中商贸评论》（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表的论文以及在不同英文文集集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机会和帮助，感谢他们敏锐的观察力与批判精神，使我的文章得到进一步的改进。2002年夏作者在台湾进行两岸加入WTO影响的研究课题，得到夏潮基金会与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基金会宋东文董事长、陈德升所长、徐思勤、徐斯俭、童振源、丁永康等朋友的襄助，使我台湾之行愉快而有收获。

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港澳台办刘然玲老师的邀请，在为北京大学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务员、社会工作者培训项目授课中，与学员们讨论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政治经济等问题，受到学员启发良多，从不同角度加深了对中国崛起问题的认识。

也感谢在北大选修我所开设的相关课程的历届本科生与研究生同学。“教学相长”，绝非虚言，同学们的发问与活跃的思想，让我时时感到压力与兴奋，不断把我推向更广的知识边界。

感谢中国市场出版社天下风华的孙忠先生，作为本书责任编辑，没有他的努力工作，本书难以在较短时间内问世，其敬业精神与出版家的专业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出版社嘱我出面邀请十余位中外杰出专家学者对本书进行鉴定评审。

专家们在繁忙日程中抽出时间或干脆牺牲休假认真审读，提出及时的反馈意见，在此对于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与鼓励表示衷心谢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甘思德（Scott Kennedy）教授对本书英文摘要进行了润色、编辑，作者深表谢意。

最后，我想表达对家人长期无私的关爱与鼓励的感激之情。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的父亲王国信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仔细阅读帮我校正笔误，并以普通读者的眼光逐章提出读后感受，大大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父亲年轻时即有文名，虽长期在政府任职，但仍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新闻报道、时评与调研报告。父亲也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父母的勉励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岳父母的关心和帮助。他们总是在我们小家庭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他们也是我讨教政治经济问题的对象，从他们那里我增长了科技与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相关知识。

感谢太太孙晴的支持与体谅。她从事外企政府关系、公共关系工作多年，经常的交流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今中外经济格局调整中不同利益主体作用与策略变迁的“窗口”。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她还尽己所能抽时间照顾家与孩子，特别是在我最艰苦的后期写作中，她承担了全部家务与教育孩子的任务。可以说，没有她的牺牲奉献，这本书可能尚在难产中。女儿王世扬懂事、体贴，给我许多安慰。每当写作遭遇困难沮丧或急躁时，女儿总来开导我，并愿意以自己小小的劳动“换取”我更多的“字数”。

孔子云：“四十而不惑”。跨进四十门槛，人生旅途行半，似乎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发展本是一个薪火相承、精神相继的过程；一个人每个小小的进步其实都是师长、朋友、同事与亲人呵护的结果。“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辈有幸躬逢盛世，亲历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翻天覆地变革，作为国际关系学人庆幸之余，也倍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吾侪理应竭尽绵力，以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王 勇

2007年初春于燕园未名湖畔

Contents

- Chapter 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hina-U. S. Trade Relations"
- Chapter 2: "China-U. S. Trade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Deepen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Chapter 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and PNTR"
- Chapter 4: "China-U. S. Trade Relations Since China's WTO Accession"
- Chapter 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U. S. Textile Trade"
- Chapter 6 "Export Controls and the China-U. S. trade"
- Chapter 7: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minbi (RMB) Exchange Rate"
- Chapter 8: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 Chapter 9: Conclus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 Summa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U. S. Trade Relations uses the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a-U. S.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since China joined WTO in 2001.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sheds light on the faulty dichotomy between the state and markets, and develops the alternative three-dimensional approach, emphasizing examination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state, markets, and interest groups in the larg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t argues that, interest groups politic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t issue areas of China-U. S. trade relations; more transnational interest groups are emerging to work together to shape th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of China and the U. S. It also addre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growi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o the U. S. - China security relations.

The book undertakes detailed analysis of issue areas, including economic and soc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U. S. and China driven by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rade imbalance, anti-dumping and frictions over further market access and protection of IPRs; PNTR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legislation; textile trade; export control, and the increasingly intens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so on.

The book presents main arguments as follows:

Since the WTO accession, China's rise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and trading system ushers in more equal trad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more symmetric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means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wo large economies has rapidly increased, and much more common stakes appear for the two countries. All these common stakes increasingly reset the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global competition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U. S. stak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U. S.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big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zed by greater reliance on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international marke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and the services industry. Thi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ets a base for the new pattern of trade politics. That is, shrinking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continues to lobby the Congress and the executive branch for more protection, but its real influence is in decline. On the other hand, groups that favor exports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increasingly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open foreign markets. Decision makers find domestic protectionist pressure as attractive tools to pressure foreign governments to make concessions to improve market access to U. S. investment and exports. This logic of U. S. trade politics is vividly shown in the China cases of textile trade, IPR protection, RMB exchange rate and elsewhere.

The superficial trade deficit of the U. S. reflects the changed nature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and that the trade counting principle of "origin of production" is outdated. Taking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reexports of American invested companies in China, branding procurement by American companies, and sales in China by U. S. invested companies, the trading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are generally balanced.

Since President Bush came into power in 2001, U. S. export control policy has both been tightened and loosened, with attempts to balance national security facing a rising China with boom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Policy inconsistency and fierce struggles over China policy expose weake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U. S. -led multilateral regimes, fierce but important competition over Chinese market, and the inseparabl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 factors" also help relax U. S. export control, including improving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e competition a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 U. S. -led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 regimes.

In the "financial diplomacy"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U. S. official position on RMB exchange rate has moved from one for more flexibility, to a floating exchange rate, and now to one for ending capital controls, as a response to changing demands from domestic groups. With the rapid rise of common stak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both countries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o accommo-

date each other to properly handle this challenge. The term “financial balance of terror,” coined by Laurence Summers, is sort of an exaggeration but reflects the new reality of more symmet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As the risks China faces rapidly rise from join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e country’s monetary authorities should reform its foreign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regime in order to adapt more timely to fluctuation of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especially changes in the exchange rate of major trading partners. China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managerial resources of U. S. enterprises to reform the lagging financial sector.

The China-U. S. relationship has greatly increased its global implications since China’s WTO accession. To secure the safe supply of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China has strengthened related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which some Americans perceive as a threat to U. S. interests. “Globalization” of China-U. S. relations brings challenges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adapt to each other but also more opportunities to build a new pattern of relations based on mutual confidence and mutual benefit. Evidenced by different power indicator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have a calm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its relative power position; China’s rapid rise from a low level, while the U. S. will keep its No. 1 power statu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It is true that the U. S. -l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has faults, is not always just and fair, but the U. S. economic hegemony provides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hich keeps the system open and stable, and greatly decreases transaction cost. China’s development benefits greatly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U. S. market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China’s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consolidates the system itself. China should work with the U. S. to keep the global economy open.

Regardi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trade friction launched by the U. 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recommends that, while learning to be flexible in using the WTO rules to protect industrial interests, China should simulate the U. S. policy-making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academia. China should watch the balance between import-competing groups and export-promoting groups in the U. S., and especially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agricultural interests. To not be afraid of confrontation and dare to mobilize counter-sanctions, is also an important tactics.